

XIFANG ZHE XUE
DONG JIAN SHI

西方哲學東漸史

蕭父題

黄见德 王炳华 著
徐玲 毛羽

武汉出版社

西方哲学东渐史

黄见德 等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邮政编码430010)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21 字数43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8.50元

ISBN 7—5430—0340—6/B·9

序

对于引进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外国的文化——不同的人历来有不同的态度。从三百多年前利玛窦等人来华时起就是这样；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情况，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总是有人反对，有人赞成，有人则犹豫动摇，或不置可否。至于具体地说什么人反对，什么人赞成，或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自然是随时间地点、条件等等的不同而变化多端，需要具体分析的。远的就不去说它了，单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路线以来，情况也远不是单纯的。表面看来，改革开放的路线得到全党全民的一致拥护，似乎也没有人公开反对引进包括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本反对引进西方哲学的人是存在的。极而言之，“四人帮”及其余孽，哪怕是在监狱或劳改队里，也总会有人始终坚持顽固立场，总不能说他们也都会真心拥护改革开放，赞成引进西方哲学吧？问题当然不在他们，而在一些自认为是坚信马克思主义、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和纯洁性的同志。他们总是对引进除“正宗”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哲学心怀疑惧。特别是看到有些青年人醉心于“存在主义”之类的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愿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是痛心疾首。这样一来，这些同志——至少是其中一些——就难免把这归咎于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哲学的作法了。我们不怀疑这些

同志的好心，也承认他们对上述一些消极现象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我们认为如果因此而反对引进西方哲学，则就难免是“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当把“引进”和“吸收”适当地区别开。我们主张广泛地“引进”各种各样有一定影响、一定重要性的西方哲学，但并非因此就主张把它们都“吸收”进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来，或把它们“吸收”进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作为它的某种组成部份。不，不是这样。我们完全承认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派别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正相对立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种哲学，我们不能“吸收”，但也同样可以而且需要“引进”，即把它们的重要著作翻译过来，加以研究，并在适当范围内加以“介绍”。目的不是为了“吸收”它的什么，而正是为了批判它，战胜它。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哲学。对于敌对思想不应该是置之不理而应当与之战斗。而通过对它的批判和战胜，也正可以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为了要批判它，战胜它，首先就必须真正了解它，研究它。靠给它戴几顶帽子，斥责一通，而不能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驳倒它，是于事无补的。当然，也再不能象过去一个时期那样，对西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概否定，全盘排斥，而必须加以分析和鉴别。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甚至包括某些就总体上看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也可能含有的部分或个别的合理成份，也都应加以肯定，或批判地吸取其有用的部分。再回到以往的自我封闭状态中去，是没有出路的。

既然今天仍旧甚至更加需要引进西方哲学，那么对于以往三百多年或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引进西方哲学的历程进行一番回顾，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索其规律性，以作当前和今后引进工作的借鉴，就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事。这工作本来早就应该

做了。可惜的是以往虽也有人在这方面尝试过，做过一些初步的或局部的工作，但在此以前还始终没有人来对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作过全面、系统的考察，因而留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块亟待填补的空白。当我几年前得悉黄见德同志有志于此事时，我是非常赞成的。而当我在三年多后的今天终于看到他所主编并亲自撰写其中绝大部分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一书的清样已放在我的案头时，心里更是异常高兴。我想，上述的这一重要空白，终于可以填补上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因此，虽然近来确实较忙，我还是尽量挤时间将全书的清样“贪婪”地读了一遍，觉得黄见德和王炳华等这样少数几位同志，在相对来说还是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一件巨大的工程，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勤奋努力，和他们的雄心壮志，都值得称道。读完全书后所得的印象，觉得至少有下列几点值得肯定：

首先，是作者搜集的材料相当丰富和全面。虽然本书涉及的题材，大都是属于距今较近时代的，不必如某些“古史”的需要“钩沉”，但也相当分散，并没有现成集结的资料可资利用，而要靠自己多方搜求才能得到。其中有些材料，也是得来不易的。作者能把这些材料加以集中并作了整理，这本身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对学术工作做出了贡献。

其次，作者不是单纯地堆积史料，而是力求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统一，写出了一部主要自鸦片战争迄止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较全面系统的历史，既有每个阶段不同特点的揭示和各阶段情况鸟瞰式的“宏观的分析”，又有传播西方哲学的各个重要人物及其所传播的哲学思想的相当具体细微的阐述和“微观分析”，并且对主要人物、主要思想一一作出了较客观公允的评价。这对于读者，特别是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可以肯定，每一位认真的读者，读完全书后，都会对直到解放前止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

再次，本书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不仅突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哲学中非其他任何西方哲学所可比拟的主导地位，而且全书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对各种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所起作用的分析，或是对各种哲学观点及其代表人物或传播者的评价，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为指导作出。与此同时，又可看出，作者也力图克服或纠正以往一度流行的教条主义或极“左”的观点，和那种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全盘否定的作法，而是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各种思想和人物作出力求符合实际的、公允的评价。

最后，作者通过对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的较全面系统的考察，虽还不能说已明确地揭示出其规律，但确实可以说已经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可给人以启迪。例如，从本书对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程的考察和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先进的爱国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因此凡得以受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而传入，并在中国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西方哲学，也总是在一定意义上能适合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哲学。否则即使有人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其他考虑，稗贩某种新奇的哲学学说或理论体系，也是不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即使有的也曾热闹一时，那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的。这正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表现。但我们也要看到，引进西方哲学，诚然总的目的是在于“洋为中用”，却不能对此从狭隘的、急功近利的、实用的观点去理解。哲学之“用”是不可能象一项先进技术或一架机器那样“立竿见影”的。即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象十年浩劫时期林彪之流所要求的那样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也只能是对哲学的一种糟蹋。西方哲学，特别是历史上的那些古典哲学，对我

们当然是有用的。譬如说，可以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如此等等。但我认为，对西方哲学的有些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即使不提或甚至没有上述的那些“用处”，应该肯定它本身就有其重大价值，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民族的文化积累所必需的。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在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哲学家或其他重要思想家、科学家等等，都既是属于他本国本民族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仅仅属于德国而不同时也属于全世界的吗？其他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等，也不仅仅是属于希腊人而是同时属于全人类；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乃至尼采、海德格尔、罗素、维特根施坦、詹姆士、杜威、佛洛伊德、萨特等等，也如我们中国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等一样，都不仅是属于各自的本国、本民族，而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尽管其价值有大小之分，乃至有正反之别，也都是全人类的财富，已非某一民族或某一集团所得而私的了。对这些思想著作进行研究、注释、评价，或翻译、介绍等等，其所得的成果，如果确是有价值的佳作，都同时既是研究者本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文化积累的宝库中的珍品。如本书中所着意介绍和作了高度评价的陈康先生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我认为就属于这种珍品之列。化如功夫去译注二千四百多年前一位外国哲学家的一篇“对话”，在一般人看来，既无补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多少人能有兴趣，有能力去读它或读懂它，真不知有什么“用处”。但是了解情况的人知道，陈先生的这一作品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西方古典研究中的最高水平，是在这一领域内能与西方的有关权威学者相抗衡，并实际超过西方学术界在这领域内的一般水平的代表作，而陈先生在读书的“序”里提出，我国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如能做到

“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参阅本书第547页）这种在学术领域高标准、严要求的严肃学风，和敢于发扬爱国正气、民族自豪感的雄心壮志，该多么令人鼓励！这种工作的价值，确不能以获多少千万亿兆人民币或美元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出版这种书，出版社也只能赔钱而得不到“经济效益”。但是，难道有谁能否定这种工作本身的十足价值吗？

从本书所能获得的经验教训或启迪，读者自会去体认，我这里不能也不必一一列举。本书的成就和优点，当然也决不止我所举的这几点，我只是在这里谈谈我作为全书第一个读者初读本书的读后感，也无意来对全书作全面的评价。当然，除了感到读后有很大收获，感到本书的种种优点之外，也还感到有所不足。例如，全书所论列内容虽较为全面，但也还是不免有所遗漏。特别是有些著名的专家教授，在学校教学中讲授和传播西方哲学，实际起了很大作用，借此培养出了许多西方哲学工作者，只因为在当时或者没有公开发表有关作品或写成教材，在本书中就未能有所反映。如汤用彤先生讲授的“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冯文潜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等课程就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自立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金岳霖先生的《论道》等等，其中也包含许多来自西方哲学如“新实在论”等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也起着传播西方哲学的作用。这在本书中有所提及，但也未能就其内容从传播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述。此外当然还有本当有所论列，只因见闻所限而确实疏漏了的。还有就是对于各种思想、各个人物及其社会作用等方面所作的分析、评价，这些本可以各抒己见，很难说本书所述，都是精当、不易之论，当然有很多都是可以而且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作为这样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巨著，成书之初会有种

种不足之处是毫不足怪的。相信通过作者和读者的进一步共同努力，这一工作定会更趋完善。

陈修斋1990年7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绪论 论开展西方哲学东渐史之研究	(1)
一 中外哲学进行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
二 中外哲学交流史之回顾.....	(7)
三 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的意义.....	(12)
第一章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西学之东渐	(17)
第一节 西学重新东来.....	(17)
第二节 西学输入的渠道和成果.....	(23)
第三节 西学输入的一段弯路.....	(28)
第二章 戊戌变法前后西方哲学之重新东渐	(38)
第一节 维新运动和西方哲学的输入.....	(38)
第二节 西方哲学输入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46)
一、译书机构的设立及其译书活动.....	(46)
二、期刊和报纸的相继出现.....	(48)
三、旧书院改制和新学堂的设立.....	(49)
四、留学风潮的兴起.....	(50)
第三节 对本阶段西方哲学东渐之宏观分析.....	(51)
第四节 对本阶段西方哲学东渐之微观分析.....	(64)
一、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	(65)
二、星云假说的最早传播.....	(72)
三、严复的西学翻译及其对西方哲学的传播.....	(80)
四、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的传播及其启蒙意义.....	(102)

五、王国维对近代德国哲学的研究	(119)
六、马君武传播西方哲学的贡献	(134)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哲学之东渐	(151)
第一节 民主革命的兴起与革命派的传播工作	(151)
一、社会条件和西方哲学东渐的新特点	(151)
二、章太炎传播西方哲学的特点	(156)
三、蔡元培对康德哲学的研究	(168)
第二节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179)
一、传播土壤和传播概况	(179)
二、《天义报》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宣传	(182)
三、《新世纪》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宣传	(186)
四、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复杂影响	(19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初具规模的介绍	(193)
一、朱执信等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194)
二、王缩尘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204)

第四章 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西方哲学东渐之高潮

..... (214)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哲学东渐高潮的出现	(214)
第二节 康德哲学全面输入	(223)
一、一个热点	(223)
二、甘蛰仙等论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227)
三、张铭鼎论康德哲学的根本思想	(229)
四、范寿康论康德的知识学说	(232)
五、吕澂论康德的美学理论	(236)
第三节 尼采哲学输入的动因及其传播	(238)
一、何以成为热点	(238)
二、茅盾对尼采哲学的全面论述	(343)
三、李石岑对尼采思想的分析	(245)

四、STW对“超人”的看法	(248)
第四节 杜威来华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	(251)
一、胡适对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	(252)
二、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	(257)
三、杜威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	(262)
第五节 罗素来华及其哲学的传播	(266)
一、罗素在华的讲学活动	(266)
二、罗素认识论及其数学方法的介绍	(269)
三、罗素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	(275)
第六节 柏格森哲学的传播	(278)
一、“柏格森号”出版前后	(278)
二、李石岑对柏格森哲学的解释	(280)
三、冯友兰对柏格森哲学的评述	(283)
四、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的比较研究	(286)
第七节 杜里舒来华及其哲学的传播	(288)
一、杜里舒来华前后	(289)
二、费鸿年《杜里舒及其学说》	(293)
三、瞿世英对杜里舒哲学的研究	(295)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	(298)
一、陈博贤译文对唯物史观启蒙的意义	(302)
二、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开拓作用	(305)
三、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介绍	(311)
四、李达传播唯物史观的卓越贡献	(319)
五、蔡和森传播唯物史观的使命感	(332)
六、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	(337)
第九节 影响和教训	(346)
第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方哲学原理的全面输入	(351)
第一节 西方哲学传播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	(351)
第二节 古代希腊哲学原著的翻译和研究	(360)

一、李石岑及其《希腊三大哲学家》	(362)
二、杨伯恺的翻译和介绍	(368)
三、黄方刚的《苏格拉底》	(370)
四、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372)
五、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373)
第三节 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原著的翻译和研究	
一、近代哲学史著作的译述和撰写	(376)
二、关其桐等的原著翻译	(379)
三、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研究	(382)
四、论文在新原理传播中的作用	(385)
第四节 康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翻译和研究	(392)
一、德国古典哲学传播的繁荣	(392)
二、康德哲学传播的新进展	(395)
三、费尔巴哈哲学启始输入	(403)
第五节 黑格尔哲学的全面输入	(409)
一、张颐的传播及其推动作用	(411)
二、贺麟早期传播黑格尔哲学的贡献	(418)
三、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425)
四、郭本道的著述特点	(434)
五、沈志远介绍黑格尔哲学的角度	(442)
六、周谷城等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450)
七、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对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解释	(455)
第六节 现代西方哲学传播的深入	(464)
第七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	(476)
一、李达的系统传播及其《社会学大纲》	(478)
二、吴亮平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491)
三、张如心著述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495)
四、沈志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	(500)
五、艾思奇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努力	(507)
六、陈唯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	(516)

第六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西方哲学之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523)
第一节 西方哲学的应用和发展	(523)
第二节 古代希腊哲学的进一步传播	(533)
一、严群的《希腊思想》	(533)
二、陈康的译著特点和理论贡献	(542)
第三节 近代西方哲学的进一步研究	(552)
一、谢幼伟的著述特点	(552)
二、郑昕及其《康德学述》	(559)
三、贺麟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进展	(568)
第四节 现代西方哲学新学派的介绍和传播中的错误倾向	(579)
一、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	(579)
二、朱光潜对新黑格尔主义的评述	(586)
三、陈铨宣扬唯意志论的错误倾向	(593)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599)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发展	(603)
二、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哲学意义	(624)
三、艾思奇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633)
四、胡绳对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弘扬	(642)
结束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647)
一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近百年历史进程的一致性	(647)
二 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必然	(649)
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652)
后记	(655)

绪论

论开展西方哲学东渐史之研究

一定时代的哲学是一定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当它问世之后，一般都有其独立发展的历史。但是，几千年来各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们还是在相互交流中，具体说来，是在相互冲突，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研究哲学史，应该首先研究各国哲学独立发展的历史。在这一方面，各国学者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特别是我国近十年来，在外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成果显著，研究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为了使各国哲学得到共同繁荣和发展，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各国哲学之间的交流史。在这一方面，虽然发表了一些文章，然而就整个研究情况来说，还处在起步阶段，基础甚是薄弱。我们认为，哲学的发展除了现实的条件以外，继承各国先辈们的哲学成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成果中，还包括各国交流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如果通过总结以往哲学交流的历史经验，对于它们之间冲突和融合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有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今后就能更加自觉地吸取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以充实和提高我们现代的哲学。因此，开展中外哲学交流史的研究，首先把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外哲学进行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要明白西方哲学之东渐，得从世界各国哲学进行交流的必然

性和必要性说起，因为西方哲学之东渐是世界各国哲学交流的一个部分。世界各国哲学交流的必要性弄清楚了，西方哲学东渐和中西哲学之间交流的必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哲学是不同的。因为任何一种形态的哲学都是以一定地域的实践条件和原有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的。而决定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实践条件和文化背景是有差别的，在这些综合条件下形成的哲学必然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世界上从国家来说，便有所谓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德国哲学，从地区来说，又有东方哲学、阿拉伯哲学和西方哲学等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哲学的区别。

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因为任何一种形态的哲学，都是以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和文化背景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实践条件和历史背景，其发展水平有高下之分，在这些综合条件基础上形成的哲学，其形态也必然有层次的差别。因此，在哲学史上，又有所谓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等不同时代性的分别。

就是这些原因，哲学的产生，不仅有地域上的差别，而且有时间上层次的不同。在各国哲学产生的初期，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交通的阻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各个地区的哲学不得不在封闭状态中各自独立发展。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进步，由于生产的发展，交通的畅达和商业的繁荣，各个地区的封闭状态先后被打破，在产品变换和学术交往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哲学交流也随之开始了。实践证明，这种交流无论对于哲学处于先进的地区还是暂时处在后进的地区，都是必要的，有好处的。对先进地区的哲学来说，是一种自我的延伸，通过它发挥的影响力，不仅促使传播地区的哲学变化和提高，而且也是使自己走向成熟不可缺少的步骤。对于落后地区的哲学来说，它通过吸取先进地区的

哲学成果，并以此作为契机进行再创造，这是使本地区的哲学得到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由此可见，哲学交流是使哲学发展和提高的重要原因。没有交流的过程，哲学是没有办法达到成熟阶段的。如果哲学发展到这个阶段，一旦停止交流过程，它就会开始消退、萎缩。因此，不同地区之间的哲学进行交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对于各个地区的哲学发展和繁荣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只有有了不同地区哲学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才能在相互比较中，对自己的哲学进行反思和总结，以便弄清和确立自己继续进步的起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吸取其他国家的异质哲学，使之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哲学。

大家知道，任何一种哲学一经问世，都不是凝固不前的。而要使它得到不断发展，除了实践提供的物质条件之外，哲学家通过对过往哲学的批判总结，也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是，要能够正确地反省过去，对它作出客观的判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常说，当局者迷。一般说来，一个生活在本民族哲学意识气氛中的人，不容易看清这种哲学的本来面貌。按哲学的说法，要认识一个事物，就要把这个事物对象化，然后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它。怎样才能把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本土哲学对象化呢？一个较为容易做到的办法，就是要超出本土哲学的局限，放眼世界，把本地区的哲学和其它地区的哲学进行一番比较。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些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有可能对本土哲学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过去中国不少学者所以不能或很少对中国古代哲学做出批判性的总结，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其它地区的哲学缺乏知识，没有世界眼光。然而，当他们具备了这些条件，并且以其它地区的哲学作为镜子来对照本土哲学时，他们对本地区哲学面貌的认识，便能看得清楚和贴切。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本国哲学中有生命的因素，哪些是发展中的缺项，只有将本国哲学放在世界各国哲学的参照系下，在与外部哲学的相